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2015)

# 中国基层治理 发展报告(2015)

赵秀玲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NUAL REPORT ON CHINA' S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2015)

# 中国基层治理 发展报告(2015)

赵秀玲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 2015 / 赵秀玲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218 - 10344 - 0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研究报告—中国—2015 IV. ①D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994 号

Zhongguo jiceng zhili fazhan baogao (2015)

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5) 赵秀玲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古海阳

装帧设计: 奔流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4.25, 插页: 2 字数: 395 千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 总报告

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发展与挑战

赵秀玲 /2

## 分报告

城市社区建设的成就、问题及对策

谢宝富 /56

基层党建工作状况、问题与突破

田改伟 /82

基层人大制度建设与创新实践

李梅 /104

基层政府治理与改革的进展及其思考

孙彩红 /129

社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探索

王红艳 /154

中国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建设

余茜 /175

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

赵秀玲 /206

## 国情调研·浙江篇

复合协同治理

——城市公共治理的杭州经验

周少来 /236

“三社联动”基层治理与服务方式的有效实践

——杭州市江干区“三社联动”方式的案例分析

孙彩红 /252

路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评估与建议

王红艳、周方冶、郭静、周石丹 /268

## 国外研究

日本行政部门在社区再造过程中的作用

——以京都府和京都市为例 [日] 藤井诚一郎著

俞祖成译 /288

美国社区治理观察与中美社区问题比较

陈承新 /330

## 专题报告

观察与思考：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创新

吴穹 /354

## 后记

赵秀玲 /379

**General Report**

-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 Level in China in 2014: Challenge  
and Development **Xiuling Zhao / 2**

**Sub-Reports**

- Building of the Urban Community: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Response **Baofu Xie / 56**
- Building of CCP at the Grass-root Level: State, Problem and  
Breakthrough **Gaiwei Tian / 82**
-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at  
the Grass-root Level **Mei Li / 104**
- Governance and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at the Grass-root Level  
**Caihong Sun / 129**
-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 Level  
**Hongyan Wang / 154**
- Villagers' Autonomy and Building of the Rural Community  
**Qian Yu / 175**
-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 Level **Xiuling Zhao / 206**

**National Conditions Survey: About Zhejiang Province**

- Multi-coordinated Governance: the Experience of Hangzhou Cit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olai Zhou / 236**
- Effectiv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nd Service Named San She  
Lian dong at the Grass-root Level: Case of Jianggan District  
of Hangzhou City **Caihong Sun / 252**

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 on the Rural Culture Hall in Luqiao  
District of Taizhou City

**Hongyan Wang, Fangye Zhou, Jing Guo, Shidan Zhou / 268**

### **Foreign Research**

Fun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in Rebuilding of  
Community in Japan

[ **Japan** ] **Fujii Seiichiro**, ( translated by **Zucheng Yu** ) / 288

Observation on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and the  
Sino-American Comparison of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Chengxin Chen / 330**

### **Monographic Study**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 Level in China in 2014

**Qiong Wu / 354**

### **Postscript**

**Xiuling Zhao / 379**

# 总报告



## 2014 年中国基层治理发展与挑战

赵秀玲<sup>[1]</sup>

### 内容提要

如果将 2012 年党的十八大视为深化体制改革的发端,那么 2014 年则为中国基层治理意义重大、稳步推进、成效显著的奠基固本之年。其最突出成就表现在:全面深化多元互动式治理、进一步拓展“微治理”、依法治理提速、将德治落到实处。当然,2014 年中国基层治理也有明显的不足,需要在 2015 年及其以后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加大文化治理的力度;第二,建立健全反腐制度机制;第三,进一步实行科学治理;第四,更大程度地进行探索创新。目前,这些重要和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瓶颈问题,也是 2015 年甚至较长时间我们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基层治理 转型 深化 挑战

[1] 赵秀玲,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基层民主、乡村治理。

如果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看成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发端，2013年为重要的开篇布局元年，那么，2014年则是意义重大、稳步推进、成效显著的奠基固本之年。面对日益复杂、风云变幻、举步维艰的2014年国内外局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中国深化改革和稳步推进的既定目标。在此，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APCE峰会的胜利召开、全力支持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控制、不遗余力参与搜救马来西亚失联航班，以及加大反腐力度和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国内形象，也为中国的各项工作确定了基调和打下了良好基础。作为我国广泛、重要、具体而又难做的基层工作，更离不开国际国内大局以及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亦离不开基层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这是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的前提与保障。只有在复杂甚至困局中为中国基层治理进行准确、动态定位，方能看到其历史性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尤其是2015年的发展动向。

## 一、 全面深化多元互动式治理

近两年，中国显然开始更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发展构想与布局，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构想、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等都很有代表性。具体到中国基层治理也是如此，城乡统筹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国策，城乡社区的互通有无变得愈加分明，这就决定了中国基层治理已走出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更具有全面、互动、互补、共生的特点。不过，与以往相比，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的多元互动发展更加突出，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一是从试点工作向全面推进转变，二是更具有体制机制的性质，三是主体性与自觉性明显增强，四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大大提高。从而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与群众基础，更具长远发展动力与影响力的中国基层治理新局面。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理解2014年的中国基层多元互动式治理。

## （一）治理边界的沟通

一般而言，基层治理需要边界意识，因为只有确立边界，才能形成责、权、利分明的制度机制，从而发挥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边界不明甚至含糊不清，是造成其治理困局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治理边界也不能画地为牢，而要给予辩证式理解，即有其沟通性和协同性，以发挥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与更大潜能。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边界就有这样的特点，在强调其明晰性的同时，沟通性得以大大加强。

就外部边界而言，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基层的关系在2014年更加通畅，这非常有助于中国基层治理向纵深推进。最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12月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sup>[1]</sup>在此，基层治理与顶层设计既有各自的边界，又形成一个更大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沟通机制，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基层一盘棋的构想设计。此外，民政部于2014年2月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旨在确立社会组织边界，给社会组织自主权；但在同年10月，民政部又发布了《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强调中央财政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与管理工作，其目的也是“优先考虑面向民生、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反映了中央与基层关系的畅通无阻。

就内部边界而言，城乡社区、政社、乡村、党政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更加明确和畅通，其联动性有所增强。如四川省彭州市的协商民主在2013年主

[1] 《习近平：推进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新华网，2014年12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2/02/c\\_1113492626.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2/02/c_1113492626.htm)。

要是二级联动，即在乡镇（街道）与村（社区）内展开；而到2014年，则成为由市委联席会、镇社协商会、村（居）民议事会组成的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这是由（县）市、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形成的三级联动。又如广东佛山市乐从镇打破各种边界，从2013年底开始在五个村（居）成立党群先锋队，2014年开始在全镇全区推广，并成为顺德区区委党建工作的重点之一，以进行基层治理的内部融通。其具体做法是：在镇上设党群先锋总队，各村设党群先锋队，下设先锋团、中坚团、顾问团，充分发挥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据平步村老党员苏见明说：“先锋队队员一般都有很大影响力，他们说一句话，比什么都管用。”而在这些先锋队队员中，普通群众占到30%左右。<sup>〔1〕</sup>显然，这对于破解长期以来横亘于党群、村社、村两委、村与乡镇之间的隔膜，是大有益处的。

## （二）治理主体的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主体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从单一由政府治理主体向多主体转变，这在近些年，尤其是2014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其鲜明特点为：一是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化，形成基层治理的全覆盖；二是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更强，这有助于发挥基层治理的潜能；三是治理主体有着更加自觉的协同意识，这是基层治理走向理性的关键因素。因此，从治理主体的协同方面看，2014年较前又有明显推进和深化。

最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初，民政部批准了在全国设立31个“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化“多元主体参与和治理”这一主旨。如要求北京市东城区实行“多元参与、协商共治”、北京市朝阳区“加强共商共治、构建协作式社区”、上海市杨浦区“增强社会协同、创新社区治理”、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多元主体、社区善治”、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增强社区服务力”、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社会

〔1〕 杨斯然：《佛山新城成立先锋队凝聚党群力量》，《珠江商报》2014年6月17日；《佛山乐从镇成立党群先锋队破解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扯皮较劲问题，把“一团麻”理成“一股绳”》，《人民日报》2015年3月27日。

机制主导,政府、社会与市场良性互动合作”、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理顺职能关系、完善社区多元治理”、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三元治理、打造幸福家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主导推动、三社发展互动、志愿团体互动,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新机制”、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探索政社互动新机制、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作,构建多元化社区养老服务”,等等。<sup>[1]</sup>由此可见,2014年党和政府对于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和理性自觉。

2014年2月8日,民政部确认北京市西城区等70个地区成为具有引领示范意义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9月,浙江省23个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示范观察点得以确定,其中涵盖了11个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创新示范观察点。<sup>[2]</sup>

再以北京西城区“全响应”治理为例。早在2012年,西城区就以“全覆盖、全感知、全时空、全参与、全联动”为奋斗目标,进行社区“全响应”式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sup>[3]</sup>不过,当时它还主要停留在设计和试验阶段。到2013年6月,“全响应”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启动,标志着社区服务管理工作迈入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轨道。<sup>[4]</sup>8月,“一号通”政府服务热线正式开通,居民只要按“12341”五个键,所有烦难事都有专人全程协助解决和解答。<sup>[5]</sup>然而,真正使西城区治理更具自觉意识、协同性更强、更富有成效的,则为进入2014年后所做的工作,这是“全响应”的网格化管理工作。其具体要求有四:一是将人、地、物、事、组织、服务资源、管理项目等,全

[1] 《民政部确认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国新闻网,2014年1月10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10/5723416.shtml>。

[2] 《浙江: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创新示范活动蹄疾步稳昂首前行》,中国社会组织网,2015年1月29日, <http://www.chinanpo.gov.cn/1938/83791/index.html>。

[3] 殷丽娟:《西城区打造“全响应”社会服务管理智能化模式》,新华网,2014年4月27日, [http://www.bj.xinhuanet.com/bjfs/2012-04/27/content\\_25146136.htm](http://www.bj.xinhuanet.com/bjfs/2012-04/27/content_25146136.htm)。

[4] 《西城区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正式启用》,首都政法综治网,2013年8月12日, [http://www.bj148.org/chuangxin/cxcswg/201308/t20130823\\_357411.html](http://www.bj148.org/chuangxin/cxcswg/201308/t20130823_357411.html)。

[5] 西城区新闻中心:《西城区:“全响应”创造城市美好生活》,《北京日报》2014年1月21日。

部纳入工作网格，从而实现管理网格、综合治理网格、社会服务管理网格三网合一。二是进一步规范社区网格人员的配备和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工作者、协管员、街道干部、执法人员、楼门院长等各治理主体的作用，那就是“基础力量一员一格、专业力量一员多格、响应力量一格多员”，形成治理主体的优化配置。三是细化工作和完善机制，建立网格员的实名制、AB角制、责任追究制及信息采集维护机制、问题源头发现机制、任务协商处理机制、问题分层处理机制、综合管理执法机制等，形成一个闭环工作的流程。四是加强工作保障机制，形成工作的合力。为此，西城区新增了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强调各职能部门将工作力量和职责直接实名下沉到社区网格，逐人、逐地、逐事明确工作任务，切实做到“工作在一线、问题发现和解决在一线”。<sup>〔1〕</sup>显然，与之前相比，2014年西城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更注重全面、具体、细致、高效，也更强调互动性、可操作性、资源优化及潜能的发挥，是多元治理主体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 （三）治理方式一体化

现代治理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克服和超越单打独斗，尤其是一盘散沙的局面，而赋予其整体感、系统性和协调功能。因此，诸如系统论、信息论、双赢理论、统合主义等就成为现代治理的理论与方法。“相比之下，‘统合主义’的翻译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这一概念所指涉的‘统治’‘合作’‘整合’等多重意涵。”<sup>〔2〕</sup>因此，从治理角度来说，从单一到合作、从分化到整合、从私利到双赢、从一己到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观念更新，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在方式上就显示出更为一体化的特点。

其实，在2014年之前，中国基层治理方式就有协同一致的特点，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因此有力推动了基层民主发展进程。如2008年以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推行“企业老总任村党

〔1〕《西城区推进2014年“全响应”网格化管理工作》，首都政法综治网，2014年3月4日，[http://www.bj148.org/zongzhi/zzqxdt/201403/t20140305\\_496789.html](http://www.bj148.org/zongzhi/zzqxdt/201403/t20140305_496789.html)。

〔2〕张汉：《统合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

支部第一书记”制度，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条上，较好地实现了村企共建、厂地双赢，探索出一条“万企联村、共同发展”的新路。其主要做法是：科学联村，选能人兼职带发展；科学管理，为老板定责促成效；科学互动，帮企业分忧谋双赢。<sup>〔1〕</sup>又如成都市金牛区于2010年和2011年建立“联户连心”机制，依托议事会沟通党群关系，畅通诉求渠道，建成决策体系。具体做法有四：一是建立一个监督平台，夯实“联户连心”基础；二是成立一个议事会议，架起“联户连心”沟通桥梁；三是制定一个共建协商制度，增强“联户连心”纵深度；四是确立一个自治方法，展现“联户连心”攻坚力。再如成都市武侯区黄门街社区于2010年前后推行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三化一制”模式。这包括：一是建立区域化党组织构架，形成组织资源与工作力量充分整合的格局；二是确立网格化功能服务，搭建公共管理与便民服务拓展延伸的平台；三是实行院落化自治管理，探索民主管理与自助服务不断创新的模式；四是创新联动参与机制，实现掌握社情与化解矛盾有效衔接的目标。<sup>〔2〕</sup>不过，这种联动方式多发生在一些具有探索和创新的典型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更缺乏有效的联动，也难以达到深度融合，因此往往多停留在条文设计和一般性推行上。

然而，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方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除了更广泛、深入的一体化特点外，其体系化、科学性、细密化与高效程度大大提高，为多元互动式治理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深圳罗湖区的社区治理。早在2013年，罗湖区就因其创新的党、政、社、群“多元整合新机制”获得“2013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2015年又获得“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这是全国唯一一家连续两年获此殊荣的单位。在此，2014年罗湖区社区治理方式一体化的深化不容忽视。如2014年6月6日，深圳市罗湖区出台了《2014年度社会建设工作要点》，其中有“突出社会建设”的“三大工程”，这包括全力推进“织网工程”、深入推进“风景林

〔1〕 中共岳阳市君山区委组织部：《科学实践促发展 村企共建谋双赢——君山区推行“企业老总任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制度》，《企业老总任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4月，第1—2页。

〔2〕 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成都市基层治理机制典型案例集（一）》（内部资料），2012年11月，第19—29页。

工程”、抓好社会组织孵化和培育工程。在“全力推进‘织网工程’”中，有这样的表述：“‘织网工程’表面上看是一项信息化工程，打通各部门的‘信息壁垒’，打造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库，实现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实际从长远看，‘织网工程’是开启政府‘大数据时代’的一把钥匙，通过信息化手段再造政府流程，创造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此，罗湖区将全区划分为1135个网格，并根据地理位置分布、不同类型网格化特点，在5个街道70个社区网格开展网格化管理，探索建立社区网格管理新的长效机制。同时，罗湖区还制定了《罗湖区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行动方案》，着力打造四大体系，它们分别是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体系、社会救济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围绕这四大体系，推行具体改革措施，探索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sup>[1]</sup>看来，罗湖区的获奖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治理方式一体化的理性自觉意识、一盘棋思维，以及将制度规范化、优化和现实化的努力探索 and 大胆创新。

## 二、进一步拓展“微治理”

在中国基层全面深化多元互动式治理，这只是2014年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细部入手，尤其是自微观层面切入开展工作，也是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略的重点。

所谓“微治理”，是对于“微观治理”的简称，它超越了以往比较注重宏观治理的局限，将治理进行细分，让治理进入“微观”和“细化”的具体层面。当然，大而言之，“微治理”也是当下“微文化”的产物和反映，其中不论是对当下社会底层还是基层治理都有积极的功效。就如学者指出的：

---

[1]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室、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罗湖区2014年度社会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罗湖电子信息网，2014年7月14日，[http://www.szlh.gov.cn/main/a/2014/g14/a268276\\_1015932.shtml](http://www.szlh.gov.cn/main/a/2014/g14/a268276_1015932.shtml)；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2014年6月27日，[http://www.szlh.gov.cn/main/a/2014/f27/a266574\\_1006007.shtml](http://www.szlh.gov.cn/main/a/2014/f27/a266574_1006007.shtml)。高申现：《罗湖改革再出发，“宁做改革恶人，不当历史罪人”》，《深圳晚报》2014年7月3日。

“在我看来，微文化的出现至少有这样几个积极功能。其一是微文化的社会交往给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以往人们无法表达的欲望、诉求和想法，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微文化的渠道来表达；其二，微文化所导致的新的人们交往的格局，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出台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其三，微文化为一些处在社会底层、边缘和少数群体的人们，提供了表达他们局部利益的可能，这些群体在大一统的信息严控的构架里是没有发言权的。”<sup>[1]</sup>因此，我们既可以说，“微治理”是“微文化”的一部分，又可以说“微治理”是“微文化”在治理中的运用，更可说二者在面向底层和基层人民群众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

### （一）治理内容的细化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基层治理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内容，诸如党的政策的下达与实施、组织建设、建章立制等，因为政不到则事不办、政不施则形同虚设。后来，中国基层治理又由政府政治治理转向社会治理，尤其是重视民生，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满意度。近年来，另一现象开始出现，即中国基层治理由关注大事向强调小事转变，2014年这一情形更加突出。因此，治理内容的进一步细化，成为近年来，尤其是2014年中国基层治理的突出特征。

以厦门市海沧区为例，由于其在2013年社区治理中的创新意识和独特贡献，它被民政部评为“2013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候选项目，其中将“微事物”嵌入居民生活就是一个重要元素。这些微事物包括：一是社区的微生活，像创新设立微梦圆愿小屋、爱心储蓄银行、贴吧交友等；二是建立微项目，像凉亭修建、水池改造等。<sup>[2]</sup>进入2014年，微事物治理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论在广度、进度、深度上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化。如果说2014年之前海沧区的微治理尚属探索和创新期，那么2014年则进入发

[1] 周宪：《可爱可恨的微文化》，《东吴学术》2015年第2期。

[2] 《关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社区“微治理”创新成果的说明》，人民网，2014年2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26/c99014-24472904.html>。

展、巩固和深化期。较为突出的例子是2014年4月在海沧区的海虹社区成立了居民大学，辖区居民可据个人爱好，免费报名参加诸如营养健康、国学、舞蹈、书法、合唱等不同课程，这是“微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厦门市首个正式注册挂牌成立的社区居民大学。开班仅4个月，学员就达到600多人，授课教师近百人。通过这种居民大学培训，既提高了大家的生活技能，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还增进了互帮互助、和谐友爱的氛围，更使居民增强了社会责任感、道德水平、公民意识，这是一种对于治理内容不断细化基础上的整合过程，从而使小事物治理发挥到最大效能。以前，海虹社区举行活动，居委会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居民也不理睬，现在只要举行活动，大家都踊跃参加，并形成人人关心集体的局面。有一次社区发起“清除牛皮癣”活动，公布仅三日，社区“牛皮癣”就不见了，如果遇到外人进入贴广告，居民争相制止。又如以前的楼道扶手无人擦拭，总是布满灰尘，大家都远离扶手上下楼梯，给老人造成极大不便。通过居民大学的微事物治理培训，66岁的周阿姨从5月开始，每次下楼都带块抹布，一直从顶楼擦到楼下。周阿姨的事迹在社区引起很大反响，于是社区居民不仅上下楼梯时会打扫卫生，且主动清理垃圾桶垃圾，从而形成社区环境的巨大改变。<sup>〔1〕</sup>可以说，社区微事物治理常态化是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的新探索与重大突破。

另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该区于2014年出台了《南岸区健全村（居）民议事机制 推进三事分流的实施办法（试行）》，将社区治理内容分为大事、小事和私事，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流管理，以区分不同事件以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以往，在社区治理中，将治理内容分为大事、小事甚至微事物都习以为常，这次南岸区将“私事”单独列出，以与“大事”和“小事”相区分，显示了2014年基层治理内容的一个新的探索与变化，也是进一步细化与科学化的表征。所谓“私事”，是指村（居）民的个人事务和市场化服务，它们将由居民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帮助。<sup>〔2〕</sup>还有，深圳市罗湖区2015年还设立1.6亿元“民生微实事”资金，将大部分项目的决策权赋予社区居民。

〔1〕 程枝文：《厦门市海沧区海虹社区：创办居民大学，探索社区微治理》，《福建日报》2014年8月14日。

〔2〕 《发展基层民主让基层议事协商更加制度化》，重庆市南岸人民政府网，2014年7月15日，<http://www.cqna.gov.cn/html/zjna/jma14/07/24843.html>。